

长江上的观音阁：洪流难撼“阁坚强”

位于长江湖北鄂州城区段小东门外长江中的观音阁，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阁”

近年来，一到汛期，这座“洪水冲不走”的“万里长江第一阁”就会走红网络，备受海内外的关注，它在滔滔洪水中矫若惊龙的模样，被网友们追捧为“阁坚强”

本报记者皮曙初、王贤

“峭壁起江心，层台水面浮。岂堪龙久卧，但见石长留。云影轻帆处，桡声夜渡头。问津何处是，一柱砥狂流。”清朝诗人姜信在《龙蟠晓渡》一诗中如此吟诵位于长江湖北鄂州城区段小东门外长江中的观音阁。自巴蜀到吴淞口，长江中仅此一阁，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阁”，引来无数文人墨客登临阁楼、赋诗题刻。

近年来，一到汛期，这座“洪水冲不走”的“万里长江第一阁”就会走红网络，备受海内外的关注，它在滔滔洪水中矫若惊龙的模样，被网友们追捧为“阁坚强”。

浩渺的长江，兼具力学和建筑之美的观音阁雄踞在巨礁之上，坐看云卷云舒，随水位变化而浮沉沉浮。这座建在江中的楼阁，为何能一次次经受住滔滔江水的冲刷？古人为何在长江中建这样一个建筑，数百年来它经历了什么，发生了哪些故事？还有哪些未解之谜？

近期，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多个水文站水位破1998年历史极值。汛情告急之下，洪水中巍然屹立于长江中游的观音阁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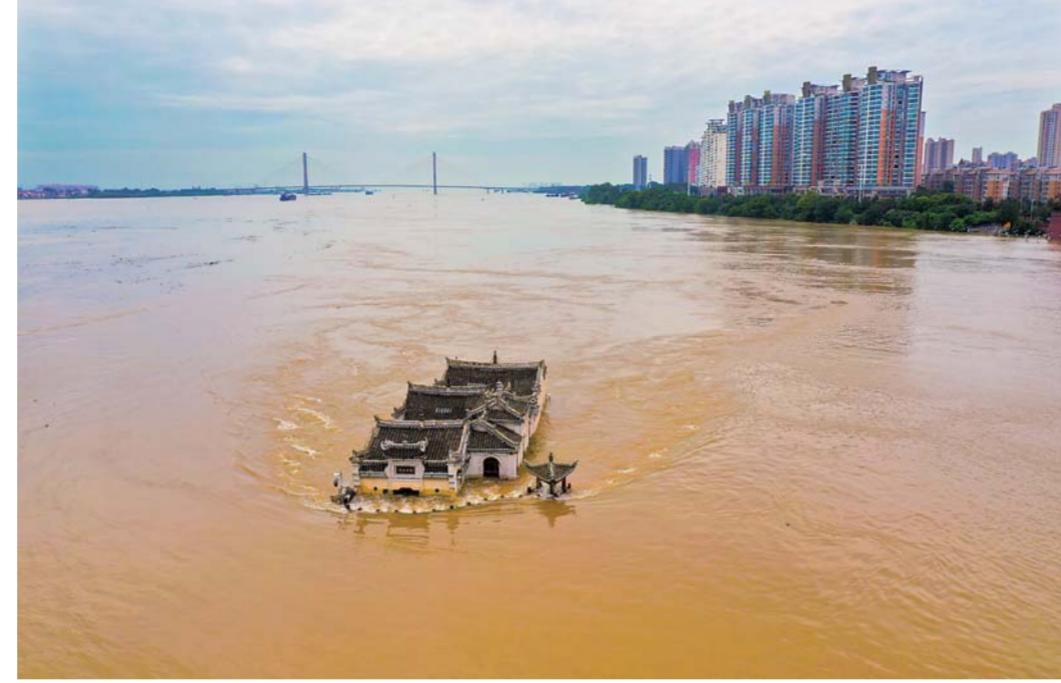
巧妙设计精心修护，“阁坚强”屹立江中数百年

7月13日，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最大一轮洪水洪峰顺利通过鄂州江段。观音阁水位达到26.78米，超过2016年的最高水位26.09米，逼近1998年最高水位27.23米和1954年最高水位27.65米。两天后，水位已有所回落，但记者在长江鄂州城区段眺望江中的观音阁，只见滔滔江水已没过了观音阁二楼窗户，原本偌大一片建筑只剩下黑色屋顶以下半米露出水面。

“没想到今年洪水这么大，二楼也被淹了。”负责观音阁管理的鄂州市博物馆馆长秦昌林说，汛期来临时，已经组织人员将观音阁一楼物品转移到二楼，关闭了过江电缆通电开关，为确保观音阁安全度汛，还特地增强防范力量，安排4人24小时监控，不间断巡查，及时了解观音阁的安全状况。

不过，秦昌林对观音阁的安全状况并不担心。他说，只要洪水没有淹过屋顶，就不会对建筑有太大的威胁，水退后维修下就可以恢复。观音阁经历数百年风雨洗礼，虽然屡屡重建，但建筑主体结构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特别是近五年来，除去年外，观音阁几乎年年进水，却并无大碍。

观音阁位于今天鄂州市城东，建在距江岸约300米的巨大礁石之上。礁石盘桓江心，石势嵯



▲洪水中观音阁。



▲枯水季的观音阁。 陈凌志摄

峨，蜿蜒起伏，如龙蟠雄踞，故名龙蟠矶。观音阁坐东朝西，阁长24米，宽10米，高14米，基座1米余，以条石垒成。阁身以红石和青砖砌就，与阁下龙蟠矶绝妙地融为一体。

如果以“上帝的视角”俯瞰下来，龙蟠矶与观音阁恰似一艘巨大的航船，在浩瀚的江面劈波斩浪，与身旁往来穿梭的小船船融为一体。

鄂州古称武昌，是东吴孙权称帝之地。据《武昌县志》等史料记载：宋时龙蟠矶建寺，历代有兴废。也就是说，龙蟠矶上的寺庙，可以追溯至宋代。但其规模和功用，已难考证。至元代，一位名叫达鲁噶齐铁山的地方官员（武昌监邑）垒石成台，再建龙蟠矶寺，方才有了今日所见观音阁的前身。

为何观音阁能在江中屹立数百年？秦昌林认为，首先是它的建筑设计十分巧妙。观音阁坐东朝西，龙蟠矶礁石上垒石成台，台上才建起楼阁，阁与矶巧妙地融为一体，巧夺天工、气势磅礴，展现了古代工匠奇妙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它依石而建、地基牢固，如同船舷一样，既减缓水势，又顺势泄流；更重要的是，在观音阁的受水面，建了一堵异常坚固的弧形石墙，这是一道挡水墙，保护观音阁主体免受洪水的正面冲击。

鄂州市博物馆文管所馆员余夏红介绍，2015年观音阁建筑本体大修，修缮前，曾委托专业机构做过地质评估，发现龙蟠矶礁石上有不少裂缝，专家评估认为这些裂缝不会影响建筑安全，不需要进行处理，可见观音阁下的礁石地基非常坚固。

建阁是为了镇水？龙蟠矶催生孙权称帝？

古人为何要在江中建这么一个建筑？秦昌林说，自古以来，鄂州一带水患频繁，为了镇水免灾，从宋代开始，当地官民便在龙蟠矶上修建寺庙。元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本地行政长官铁山在原先的庙基上督修建阁，原名“大土阁”，后更名为“观音阁”，也叫龙蟠矶寺。

明代周儒《观音阁记》中所载，“元监邑铁山，垒石成台，跨鳞翼，上连石梁，梁间刻东方曼倩铸像，降水势，示过舟也”。元明时期，长江中游商贸繁荣，水运发达，江心有巨礁，对航船来说是很危险的事情。人们在石上修阁筑寺，既期望能镇水避

灾，又给过往船只以警示，也是顺理成章。不过阁中以东方朔为供奉对象，以降水势，却是比较独特的。

“观音阁，随水涨，随水落。”许多鄂州人都能吟唱这首古老的民谣，并有不少关于观音阁帮助人们平安度过水患的传说，传递出洪魔袭来时观音阁能伏波安澜、化险为夷的美好愿景。当然，观音阁并非真的可以随水起落。鄂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蔡清华说：“观音阁不易被冲毁，是因为它建得比较高，很难被完全淹没；但是一旦遇到罕见大洪水，损毁也在所难免。”

实际上，自宋代始建以来，观音阁历尽沧桑，屡有毁建，经过了无数次的重修。

明代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春，观音阁毁损，武昌知县许嵩率幕僚登临龙蟠矶，说了一句：“武昌之奇观，不可废此。”于是督促阁中僧人募资重修。“越明年落成，视昔尤伟，观澜有亭，宾宾有楼”，增建了观澜亭、寅宾楼。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钦差大臣官文驻节鄂州，治军整暇，偶见江心有小岛横江而峙，上有阁阁，奇而徇之，知为“武昌八景”之一。于是“复旧观，且稍拓而大之”，并题书“龙蟠晓渡”四字，刻石嵌于寺门楣上。时人王家璧著《重修龙蟠矶寺记》一文记之。他说，这一次重修，“凡费制千七百石，公（官文）分鹤奉千金，余则属僚暨邑人士之好义者协以成之”。

如今的观音阁，正壁镌有“观音阁”三个大字。阁内有一亭三殿一楼，总面积300平方米，由西向东依次是观澜亭、东方朔殿、老君殿、纯阳殿、寅宾楼，还有客堂、丹房、斋厨等。

秦昌林介绍说，在观音阁内，既有东方朔殿，也有老君殿，还有纯阳殿、寅宾楼，既供奉有石雕观音菩萨像，也有八仙石刻塑像，体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以道为主的传统文化特征。

远眺滔滔洪水中的观音阁，你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在狂流中屹立的雄姿，更能深深体会到一种饱经磨难而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力量。

不远处，鄂州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幅“即位祭天”的展陈图文讲述了龙蟠矶的不同寻常。龙蟠矶似潜龙出水，昂首江中。三国时期，孙权将其军事指挥中心迁到此地，取“以武而昌”之意，将鄂县更名为武昌。据说，某天有人来报，城北江心巨礁之

上，有黄龙蟠卧；城东虎头山上，有凤凰鸣。百官进言，武昌是“龙蟠凤集”之地，有帝王气象。

于是，孙权于公元229年在此称帝建都，并改年号为“黄龙”。从此，孙吴称雄江东，三国鼎立数十年。

观音阁仍有不少未解之谜

“昔日吴王避暑宫，三分割据各称雄。黄冈对峙沉云黑，赤壁鏖兵两岸红。半岭石岩曾试剑，中流砥柱有蟠龙。千年霸气消磨尽，再看金汤奏凯功。”官文也是晚清名臣之一，一度出任湖广总督。虽无治世才能，然而亲临观音阁，见石矶轮廓，古阁耸峙，威镇江心，写下的这首诗也是霸气侧漏。

不过，1931年的大洪水再次令观音阁“栋折椽塌，寸木片瓦，一无所存”。据时人谢绍方《观音阁记》载，适逢木材商人陈芝生木排顺流东下，不料搁浅矶头，推不能进，挽不能退，乃许愿祷求，捐洋一千元，杉树六十根，以修庙宇。当地土绅也纷纷解囊，“以建斯阁，而存古迹”。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多次拨款维修，并不断配置文物保护附属设施设备。1954年，长江遭遇一次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将观音阁冲毁成断壁残垣，由当时的鄂城县文教局呈请湖北省文化局拨款重修。1982年到1985年，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拨专款维修。1996年7月，洪水猛涨，观音阁后殿东南台基崩塌一半，部分门窗陷入水中，洪水过后，省、市拨出专款进行维修。1998年，观音阁又一次被大洪水全部淹没，部分设施遭受损毁，湖北省文物局下拨救灾款3万元维修。

2015年，经过7年多的立项、审批、设计和建设后，政府耗资七八百万元，对观音阁本体进行维修，并购置了安防、消防、水电、防雷、工作用船等设施设备，使得这一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焕然一新。

“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防洪能力强大了，像2016年和今年这样的洪水，都能安然度过，现在观音阁真正有条件屹立不倒了。”多位当地干部说。

今天，观音阁已是鄂州城中一处亮丽景观，

融自然之壮阔与人文之丰厚为一体。阁边江岸，早已不见以往的乱石荒滩、低矮民房，而是固若金汤的江堤，嘉树争华、小亭临风的江滩公园。极目远眺，对岸黄州如带，赤壁如虹；江面上浩渺辽阔，巨轮往来，一派繁盛；而回身反顾，则是西山积翠、南湖夜月。

丰富的传说，动人的故事，旖旎的风光，吸引着市民和游客来此驻足。尤其是到了汛期，到这里观看水景，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2001年10月，国家邮政局发行《鄂州观音阁》普通邮资封一枚，采用铜版画技法设计的邮资图，江水共蓝天一色，表现出万里长江第一阁威镇江天的气势。2006年5月，观音阁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电影《长江图》中，有女主角游泳登阁的镜头，画面唯美令人向往，但如今的观音阁只可远观、不能登临。秦昌林说，观音阁悬于水流湍急的长江之中，所处位置环境十分特殊，为了确保游客和文物安全，政府关闭了游客参观通道，不向公众开放，这也给它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作家刘敬堂说，观音阁是一种文化，文脉源远流长，若改变了她的身份，损坏了她的模样，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今人应当做的，是保护她，珍惜她。

记者了解到，由于与观音阁相关的文字记载十分有限，少数的史料记载也只有寥寥几笔，特别是明代以前的史料少之又少，给文物考证和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障碍。当前，关于观音阁的前世今生，还有不少谜团有待进一步考证。

倘若修建观音阁是为镇水，为何只在梁上放着东方朔的像，却没有大禹、龙王等传统治水图腾的踪迹？宋元时观音阁的建筑规制和周边环境是什么样的，如今位居江中的阁楼当时是否也立于长江之中？应对洪水冲刷十分关键的挡水墙是什么时候建设的，这堵墙为何能屹立数百年不倒？古人设计这座建筑基于什么样的建筑思想……

秦昌林坦言，关于这些疑问，有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有些现在还只能靠推测。他希望加强对观音阁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挖掘，更多专业人才能够加入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中，发掘文物之美，汲取古人的智慧。

长城边的盐池县：盐尽仍留“盐文化”

本报记者荀伟、许晋豫

如今廉价的食盐在古代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有着2000多年产盐史的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因盐而兴、因盐得名，因军事防御和盐池之利，隋、明两代更是在盐池县境内修筑4道长城，盐池县因此被称为“露天长城博物馆”。

在陕甘宁边区，盐池县所产盐作为边区的经济支柱，曾为边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曾指出：“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

随着时代变迁，池盐已不复当年辉煌，盐池县从2000年起几乎不再产盐，尽管没有了池盐之利，盐池县依托滩羊产业等，成为宁夏首个脱贫摘帽贫困县。为发掘池盐的历史文化内涵，盐池县正在着手修复打盐工序，开展打盐体验游，“复活”池盐文化，提升盐池县文化软实力。

长城与池盐的故事

从宁夏银川市出发向东行驶，进入吴忠市盐池县境内，高速公路两侧的长城、烽火台、城堡便明显增多。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的盐池县为何有如此多的长城遗址？答案是池盐。

在古代，因盛产池盐，偏居西北的盐池县不仅因盐兴旺，甚至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进而有了长城与池盐的故事。

盐池县先秦时为“戎狄居地”，所产池盐被称为“戎盐”。汉代，盐池境内设昫阳县，并在此设置盐官。《汉书·地理志》记载：“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水经注》曰：“高平”川水又北，迳三水县西，肥水注之……(肥)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又说：“县东有温泉，泉东有盐池。”据宁夏社科院研究员薛正昌等人考证，书中“盐池”便是盐池县南部的惠安堡盐池。除了历史记载，盐池县境内的张家场汉墓群还出土了盛有食盐的陶器。

盐池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党英才说，历史上，盐池县有大小盐湖二十多处，比较有名的有惠安堡盐池、溢泥池、苟池、北大池等七八处。

历朝历代，盐都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尤其在明代，因蒙古诸部南下，明代在盐池境内共修筑有3道长城，北部的“头道边”“二道边”与池盐紧密相关，附近均有盐池分布。现如今，盐池县仍有隋、明长城250多公里，从盐池县随处可见的明长城遗址依稀可见当时的宏伟气魄。

明代花马池城今为盐池县花马池镇，是盐池县政府所在地，周边有大小盐池数个，此地因用池盐换马最早被称为“换马池”，后改为花马池。明代历任三边总督，都在花马池一线加大兵力，修筑长城。明朝正德（1506—1521年）初年，总制陕西军务的杨一清曾驻守花马池城，当时仅花马池城就有戍防军队一万余人。

嘉靖十九年（1540年）后，西北防御压力加大，花马池城在秋防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兵部要求驻节今原市的陕西三边总督（辖甘肃、宁夏、延绥三镇）每年秋天亲往花马池城调度指挥，并驻于此。这说明除了防御，“防护盐池，以通盐利”显得更为重要。

明代崔允曾作《花马池咏》，写道：“秋风掠下边城，万里河流绕骑清。榷组试看酬壮节，壘鞍到处行旌。寒骑强弩云传箭，砲转轻车火作营。慷慨十年长剑，登楼一笑暮山横。”可见当时花马池沿线浓重的军事氛围。

现在唾手可得的盐在古代价比黄金，明朝周澄写有五言诗《盐池》赞美惠安堡盐池，其中两句写道：“调和偏有味，生产自无穷。若使移南国，黄金价可同。”池盐因此在明代成为重要的军费来源。长城沿线驻守大量官兵，对粮草、军马等的需求数较大，明代便通过“纳粟中盐”“纳马中盐”“纳茶

中盐”等方式，用盐为军队换来各类物资和银两。据薛正昌考证，正德年间，灵州池盐年销量已接近18万引，约1800万公斤。

大家到盐池驮盐去

当记者来到距离盐池县城十多公里的八路军三五九旅打盐处，久经风雨的明长城遗址在开阔的平原上显得有些低矮，2000多名八路军指战员打出的窑洞已不复当年模样。汽车在长城脚下往来，不远处的盐池在夕阳照耀下光洁如镜，颇有壮美荒凉之感。

80多年前，这里打盐的热闹景象曾让埃德加·斯诺心向往之，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苏区企业中最大最重要的就是宁夏边境长城上的盐池的制盐工业和永平、延川的油井……盐池的盐是中国最好的，所产的盐色白如晶，产量很大。”

在革命时期，对于苏区而言，盐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盛产盐的盐池县则为边区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6月解放后，盐池县因产盐成为边区“聚宝盆”，盐业发展迅猛。1936年10月，毛泽东在盐池县成立了盐池税务局。1937年，陕甘宁边区更是发出了“大家到盐池驮盐去”的通知。

尤其是1941年开展大生产运动后，盐池掀起打盐高潮。除了当地民众，八路军三五九旅四支队2000多名指战员来到盐池集体打盐，修筑盐田1094亩，一年打盐62万驮左右。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局《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指出“组织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党和边区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

因池盐产量大增，以至于盐池县驮盐的毛驴、骡子不够用，盐池群众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用牛驮盐，用牛驮盐速度虽不及骡马，但胜在驮盐量大，

这在当时还作为重大新闻被《解放日报》配图刊发。1943年，陕甘宁边区三边专员罗成德还因打盐被评为“劳动英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从盐池运出的食盐约有1236.3万驮，合12.5亿公斤左右。盐池所产盐除了满足边区需求，还为边区换来了急需的各类物资。

“复活”池盐文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盐池县的池盐产出逐渐下滑，以至在2000年后几无池盐产出。而的背后除了行政区划因素外，耗费大量人工、效率相对较低也使得池盐逐渐没落。

记者驱车在惠安堡盐池边缘行驶时，70岁的老盐工茹汉民颇为紧张，水量较少的盐池更像沼泽，汽车很容易陷进去。盐池里过去“田”字形的盐田、